

DOI: 10.19411/j.cnki.1007-7030.2021.01.003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历史和实践

郭冠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摘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中国生产力条件和国内外环境,统筹国内国外两种市场资源的演化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新发展。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涉及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如何从学理上给予解释,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依然是一个难题。围绕国内循环、国际循环和循环的运行机制这三个方面,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以重新解读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石,构造一个开放条件下国家变量内生的经济循环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循环的历史进行考察,分析后疫情时代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 双循环; 比较优势理论; 国民经济学; 唯物史观; 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21)01-0028-13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并不是一个偶然性命题,而是在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美关系“脱钩”危险、新冠疫情的持续冲击,世界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科学选择。对于这一时代命题,如何从学理上给予解释,并为后疫情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仍然是一个迄今未解的难题。为了给予学理分析,本文首先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经济循环理论的演变进行梳理,重点对新的历史方位下,比较优势理论可能带来的危害和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的当代价值进行分析,然后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石,构造一个开放条件下,国家变量内生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历史进行考察,重点对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的误解进行分析,最后对后疫情时期如何“畅通国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20ZDA014);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作者简介: 郭冠清, 经济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教授, 《资本论》研究室主任, 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办公室主任, 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经济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和经济思想史。

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研究。

一、经济循环的理论基础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涉及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至少包含三个命题：一是国内循环，对应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二是国际循环，对应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三是循环的运行机制，包括国家的作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围绕这三个命题，我们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进行考察，并以重新解读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石，构造一个开放条件下，国家变量内生的经济循环理论分析框架。

（一）魁奈的《经济表》：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分析的尝试

作为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是人类历史上首次试图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做出科学分析的学者。尽管在魁奈之前，坎蒂隆已经作出尝试，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是缺乏医学经历的坎蒂隆，很难像魁奈那样用“血液循环”等医学思想来深入研究经济问题，而且由于缺乏数学训练，坎蒂隆也很难构建经济研究中的数学模型。魁奈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分析，集中体现在《经济表》中。^①

在《经济表》中，魁奈将社会分成耕种土地的生产阶级、包括君主在内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不生产阶级。^② 生产阶级预付农业劳动上的开支，并为土地所有者提供每年的收入，土地所有者阶级依靠“纯产品”生活，不生产阶级从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那里获取收入。^③

在区分了这三个阶级以后，为简化分析，魁奈假定每年的生产规模不变（即简单再生产），价格不发生变化，阶级内部不发生交换。魁奈还在流通开始前作出假定：生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最初原预付为 100 亿里弗尔，每年再投入 20 亿里弗尔的“年预付”，每年创造出价值 50 亿里弗尔的年总产品。在流通前，生产阶级将上一年度流通中收回的 20 亿里弗尔以地租形式交给土地所有者；20 亿里弗尔地租是国内流通所需的货币总额，在流通中起着杠杆作用；不生产阶级在流通前的工业品价值 20 亿里弗尔。以下是经济表图示。

从图 1 可知，整个流通过程可以被分解为商品和货币流通的 5 次交换行为，每次 10 亿里弗尔的产品，共交换 50 亿里弗尔的产品，其中包含 20 亿里弗尔的工业制造品和 30 亿里弗尔的农业产品。具体过程如下：1. 土地所有者阶级用 10 亿里弗尔向生产阶级交换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2. 土地所有者阶级用 10 亿里弗尔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品；3. 不生产阶级用从土地所有者处获得的 10 亿里弗尔向生产阶级购买生活资料；4. 生产阶级向不生产阶级购买价值 10 亿里弗尔的工业品（生产资料）；5. 不生产阶级又用向生产阶级出售工业品所得的 10 亿里弗尔购置农产品作为工业原料。

^①郭冠清：《西方经济思想史导论》，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 年，第 31—35 页。

^②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吴斐丹、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 309 页。

^③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吴斐丹、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 311 页。

经过上面 5 次交换，形成了这样的结果：土地所有者阶级用他们在流通前所取得的 20 亿里弗尔货币地租，换取了 10 亿里弗尔的生活资料和 10 亿里弗尔的工业品，得到了他们所“应得”的“纯产品”；不生产阶级得到了 10 亿里弗尔的生活资料和 10 亿里弗尔的农产品（工业原料），保证再生产的继续；生产阶级以上一年度生产中的价值 30 亿里弗尔的农产品（20 亿里弗尔的生活资料和 10 亿里弗尔的工业原料）换得价值 10 亿里弗尔的生产资料和 20 亿里弗尔的货币。除了这 30 亿里弗尔进入流通外，生产阶级还有价值 20 亿里弗尔的农产品作为种子和本阶级的生活资料，不参加流通。这样在本年度，简单的再生产可以再进行，而在本年度生产全部结束后，同样的流通又可以再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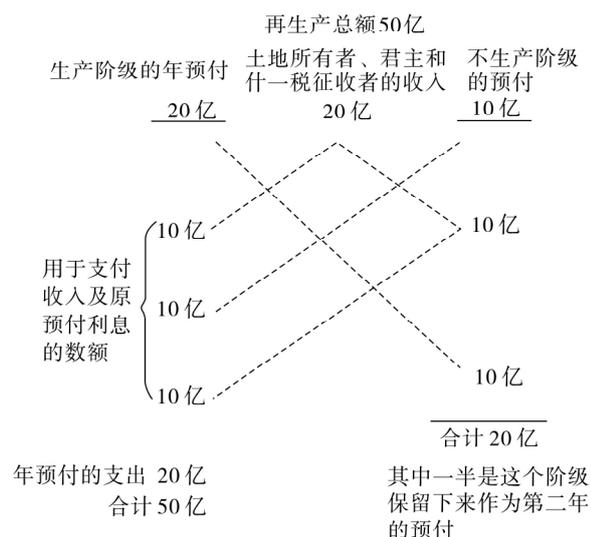


图1 经济表的图示

魁奈创造的《经济表》被他的信徒称为“人类迄今为止的第三大发明”，经过马克思的深入研究变成了《资本论》中的“再生产图示”，经过瓦尔拉斯的精心雕琢变成了一般均衡体系，经过列昂惕夫的适度修改变成了完美的“投入—产出表”，经过斯拉法的认真研究变成了完整的商品“价格体系”，而更令人叫绝的是，据说《经济表》是凯恩斯“乘数理论”的第一个粗略表达，而且预示着计量经济学的诞生。由此可以看出，在寻找双循环理论基础时，不研究《经济表》一定是一个遗憾。可惜的是，魁奈的创造性研究并没有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得到发展，斯密在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进行分析时，将“原预付”和“年预付”换成了“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这是一大进步，但是在价值分解时，他忘记了马克思术语中的“不变资本”部分（这就是著名的“斯密教条”）。李嘉图也没有从“斯密教条”的误区中走出，只有马克思才走出了这个迷雾。

（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国际贸易理论的经典

尽管亚当·斯密的贸易理论也包含比较优势原理，^①但是考虑到李嘉图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比较优势学说，本文仍将李嘉图作为比较优势学说的开拓者。对于比较优势学说，李嘉图没有给出数学模型，而是通过英国与葡萄牙两个国家生产酒和毛呢的例子进行说明。根据李嘉图的理论，即便葡萄牙在生产酒和毛呢方面都有绝对优势，英国与葡萄牙各自按照相对优势进行生产，通过贸易可以使英国和葡萄牙的收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7—8页。

益都提高。这意味着自由贸易才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利的贸易。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经典与核心，当代的国际贸易学说基本上都是围绕它展开的，我们熟知的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学说不过是为了解释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而提出的，用来说明参与国际贸易交换的商品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原因。对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里昂惕夫在 1951 年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贸易方面的论文，他指出，如果美国是物质资本丰裕和劳动力缺乏的国家，那么美国应该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是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对于“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在后续论文中进行了解释，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是其他国家的 3 倍，以此计算，美国是劳动相对充裕而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美国的对外贸易并未违背比较优势学说。^① 对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马克思是比较认可的，这一点可以从《资本论》第 3 卷第 14 章中关于对外贸易的评价看出，其论证逻辑与李嘉图的论证基本相同。^②

比较优势学说为国家之间的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依据，但由于忽略了“国家”的存在，可能陷入三种“比较优势陷阱”：第一，“萨缪尔森陷阱”。比较优势学说只考虑了静态的情况，它没有对贸易双方的收益情况进行动态分析，没有考虑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等成本随着时间的变化。正如萨缪尔森在一篇论文中所指出，贸易条件的改变对一国来说可能是永久性损失；第二，“李斯特陷阱”。当暂时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具有“学习效应”时，实行自由贸易可能会带来“净损失”，这个分析来源于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第三，“中等收入陷阱”。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贸易，一定是高端产品与低端产品的贸易，考虑到路径依赖和转移成本较高，落后国家在技术进步、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存在严重不足，一般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③

（三）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被忽视的经济循环理论

与忽略“国家”存在的自由贸易学说不同，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融合当时德意志地区流行的“国民经济学”概念^④提出的“国民经济学”把“国家”置于核心位置，以“国民经济学”对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开创性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统筹国内国际市场两种资源的经济循环理论。可惜的是，李斯特的理论由于反对自由贸易而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抛弃，由于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而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认可，由于扫清一切阻碍国内统一市场的政策主张而被封建当局迫害，以致于他的学术地位长期被低估，他的思想光环长期被淹没。重新梳理李斯特的理论，对于统筹国内外市场两种资源，畅

①李翀：《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的构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150—151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64—265 页。需要说明的是，中文第 2 版相关部分的翻译比较晦涩，需要参考中文第 1 版的翻译。

③郭冠清：《从经济学的价值属性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经济纵横》2019 年第 7 期，第 19—26 页。

④杨春学：《国家主义与德国历史经济学派》，《社会科学战线》2020 年第 6 期，第 35—46 页。

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李斯特理论中的“生产力”地位

在李斯特看来，世界主义经济学主张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不过是一套骗取落后国家财富的骗术而已，世界主义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忽略“国家”的存在，主要对财富本身（价值）而不是对产生财富的原因（生产力）进行研究。由于“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①，“国民经济学”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分析财富的原因上来。^②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李斯特提出了“国民生产力学说”，构建了李斯特理论的基石。对于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李斯特列举了许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教育、科技对生产力的作用；（2）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对生产力的影响；（3）产业部门间的协调对生产力的影响；（4）民族精神对生产力的影响。

尽管在新的历史时代，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总体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新时代的主旋律，“国民生产力学说”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的发展依然具有借鉴意义。^③

2. 李斯特理论中的“国际市场”问题

基于对当时德国生产力状况的深刻理解，对美国、俄国、法国等当时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的深入研究和在新兴体美国“流浪”期间的亲身经历，李斯特提出了“幼稚工业”保护学说。李斯特认为：“在与先进工业国家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即使极端有资格的发展工业，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的发展，也不能挣得圆满无缺的独立自主地位，流行学派没有看到这一点。”^④

需要说明的是，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与主张国家干预的重商主义理论不同，它是按照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有选择性地进行“保护”，它以促进国民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对此，李斯特强调，“保护制度必须与国家工业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只有这样，这个制度才会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对于保护制度的任何夸张都是有害的；工业的充分发展是只能逐步实现的。由于这个原故，在工业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国家，为了使各种不同的工业品得以进行交换而订立互惠商约是彼此有利的。这时比较落后的国家，虽然自己还不能比较有利地从事于生产较精细的工业品，例如高级棉织品和丝织品，但是先进国家对粗制工业品的部分需要，却可以在商约的促

①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5页。

②对此，李斯特提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来越穷。一个人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18页。

③郭冠清：《从经济学的价值属性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经济纵横》2019年第7期，第19—26页。

④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67页。

进下由比较落后国家来供应”^①。对于“幼稚工业”保护究竟是否有利于落后国家的发展,《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自由贸易和保护”条目的撰写者芬得雷在假设征税和支出没有成本的前提下,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原理证明,使国家福利最大化的那些必要的补贴可以通过一次总付的税收这种非扭曲的方式获得。^②左大培不同意这种观点,他的研究表明,即便在国际贸易中按照比较优势原理进行自由贸易,然而在工业新产品制造部门中具有人均产出优势的国家也必定是一个富国。左大培通过严密的数理逻辑证明,只有在对进口的新产品征收关税,促使国家人均资源新产品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保护关税才能够通过扶植一国新产品的生产而使落后国家变为富裕的先进国家。对进口新兴产业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是促进落后国家发展的最有力手段。^③

3. 李斯特理论中的“国内市场”问题

如果认为李斯特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反对自由市场,那一定是一个错误。从最本质上来看,李斯特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说他是“德国的斯密”并不过分。正如杨春学所讲,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他对自由的赞美、对自由与生产力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强调、对封建主义的无情批判、对取消国内贸易壁垒、建立国内统一市场的呐喊。^④

李斯特以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础,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目标对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种市场资源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的理论对于我国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如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都有启发性。

(四) 经济循环理论:以国家为变量分析框架的构建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未来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自由贸易扫清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埋葬资本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⑤因此,尽管马克思的“六册计划”中包含“国家”和“对外贸易”,但是要从马克思已有理论中直接寻找经济循环理论却是不可能的。下文尝试以重新解读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石,构造一个开放条件下,国家变量内生的经济循环理论分析框架。

1. 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

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

^①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74页。

^②史蒂文·N. 杜尔劳夫、劳伦斯·E. 布卢姆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52页。

^③左大培:《“李斯特命题”的数量化模型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8期,第25—36页。

^④杨春学:《国家主义与德国历史经济学派》,《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6期,第35—46页。

^⑤郭冠清、陈健:《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经济核算”难题吗?——“苏联模式”问题和“中国方案”》,《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2期,第12—21页。

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这个方法就是唯物史观，是分析经济循环的方法论基础。需要说明的是，迄今为止，我国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没有摆脱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普遍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相关论述视为唯物史观的经典，^②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③中去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根据笔者的考证，生产方式是一个独立的范畴，并不是斯大林定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还存在生产方式中介，即“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产生和变革的基础，但是生产方式不是生产力的单调增函数，甚至也不是它的单调函数，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一个滞后变量。^④根据“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社会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它的生产力基础，这是分析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但是我们可以寻找促进生产力的制度安排，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每一个发展阶段，都面临着在生产力约束下选择经济循环方式，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问题。重新解读的唯物史观提供了揭开经济循环神秘面纱的方法，是本文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2. 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石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评论，《资本论》揭示的是现代经济社会的运行规律，自然在一般意义上也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资本论》是否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评论，在学理上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难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因为，无论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只要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样都是适用的，诸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积累规律、社会总产品实现规律、利润最大化原理、提高利润率和积累率的方法、竞争与垄断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都同样适用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并未过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依然闪烁着真理光芒，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我们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地去学习和掌握《资本论》所阐述的这些科学的共性原理，并善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页。

②郭冠清：《新中国70年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59—73页。

③郭冠清：《回到马克思：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再解读》，《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第5—13页。

④郭冠清：《回到马克思：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再解读》，《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第5—13页。

于运用这些原理去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①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底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②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只要对它进行创造性转换，即把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分析转换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来，就可以用它作为经济循环的理论指导。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中，增加国际贸易条件，寻找经济循环的理论支撑，但这只是对附加国际贸易条件的“流通”环节的分析，不是经济循环的全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剩余价值生产”依然是主要内容。

在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石构建经济循环理论时，“国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我们要把“国家”作为内生变量置于其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李斯特等人的贸易保护理论的批判，是基于扫除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革命进程的因素之需要，他们设想的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组成的社会是没有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高度发达程度，国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物，而是必须考虑的变量，这在分析“国际循环”时尤其重要，否则很容易陷入比较优势的“低水平陷阱”之中。

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演化

在“中国道路”成功的经验中，“统筹国内国外两种市场资源”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中国生产力条件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统筹国内国外两种市场资源的演化结果。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出口替代和自力更生为主战略

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依据当时生产力水平和国内外环境，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化强国，除了实施“出口替代”战略、引进技术和设备外，别无选择。在“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市场资源，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依托，重点进行了694个大中型项目的建设，1957年中国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128.6%，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56.5%。^③与大量引进技术设备相关，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增长较快，1953—1957年进口总额年均增长率为7.52%，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为10.94%，^④出口增长比进

①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第26—38页。

②郭冠清：《论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认识〉一文的学术贡献》，《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9—26页。

③王瑶、郭冠清、黄志刚：《新中国70年党的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上海经济研究》2019年第12期，第14—24页。

④江小娟：《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26页。

口增长更快并不是为了扩大市场，而是为了提供必要的进口能力。

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将经济循环彻底打乱，将中国经济引入灾难。对于这一灾难，仅仅把它归结为关键领导人的错误判断并不客观，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代价。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也遭遇挫折，1958年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1960年7月，苏联中止了同中国的大多数合作项目，撤走专家。在这种情况下，能利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市场资源不复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继续进行经济封锁，除了走向“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道路外，别无选择，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当时生产力状况和国内外环境作出的必然选择。经过两年多的徘徊，1962年9月，我国从日本引进了第一套设备，开启了向发达国家引进先进设备之路。1963—1966年，我国与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国签订了80多项引进合同，用汇2.8亿美元，同时也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进成套设备和单项设备，用汇2200万美元。^①至此，在新中国建设初期，我国的经济实现了从“出口替代”向“自力更生为主”的转变，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资源依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出口导向战略

虽然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通过实施“出口替代”和“自力更生为主”，初步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依然没有走出“贫困陷阱”。1978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只有1.8%，^②经济水平仅相当于富裕国家的6.8%，^③而且还处于半封闭状态。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额仅排在世界第29位，对外经济依存度为9.74%。^④在国际环境方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经过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较量，亚洲四小龙依靠出口导向战略迅速崛起，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衰退，迫切需要在全世界配置资源，而1979年中美建交，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封锁被打破。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考察西欧经济，1978年和1979年邓小平分别访问日本和美国，通过对外开放改变中国落后状态的大气候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为对外开放准备了物质条件和经济安全保障。1979年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的倡议下，我国开始尝试在深圳和珠海两地建立“特区”，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序幕。当时正值全球“代工贴牌”生产的兴起时期，在外汇缺乏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开展对外贸易成了一个自然选择，于是在广东沿海地区出现了一大批“三来一补”企业（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是指不需要用外汇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由合作的

^①江小娟：《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1—42页。

^②武力：《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与经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第337页。

^③王瑶、郭冠清、黄志刚：《新中国70年党的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上海经济研究》2019年第12期，第14—24页。

^④武力：《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与经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第337页。

外国投资者提供原材料、中间产品、图样，我们做的是利用这些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行加工，加工后创造的产品通过外国投资者寻找的市场进行销售以赚取外汇，这样“三来一补”兴起了。1987年原国家计委副研究员王建敏锐地看到农村改革带来的机会，提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用换回来的外汇加快我国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建议。^①虽然这个建议在当时也引起争议，但是由于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很快成为中国的一个发展战略。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际大循环”战略，标志着我国出口导向战略的正式形成。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要素低成本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渐融入“国际大循环”之中，对外贸易总额以每年3000亿美元以上的数量增长。^②到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63%（峰值达到64%以上），中国出口额占全球比重跃升至首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大循环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的弊端开始显露。为应对金融风暴的冲击，我国出台“四万亿”财政投资计划、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和扩展消费等政策，以扩大内需，转向国内循环。从结果来看，我国经济一枝独秀，率先复苏，但是，这种刺激经济的副作用很大，出现了房价飙升、产能过剩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完全消除。

对于出口导向战略最大的误解莫过于认为对外开放影响了技术进步，并以此来解释我国在关键技术上被“卡脖子”的原因。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我们不熟悉美国和德国在走上富强道路的“保护”时期如何通过引进技术获得发展，我们应该清楚，正是因为苏联专家的帮助，我国才得以在新中国建设时期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此，我国在经济上“站起来”了。在芯片技术上，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在改革开放前与世界的差距很小，正是因为对外开放，放弃了自主研发，才使我国落后的。事实上，就笔者曾经从事芯片行业工作的切身体会来看，^③如果不从美国引进生产线，不对芯片技术进行引进和消化，我国在芯片技术方面或许至少还落后美国30年。韩国之所以能打破“硅周期”，实现芯片技术方面的突破，离不开美国高端人才的引进。^④华为公司能成为5G技术领先者，离不开对世界顶级人才的引进，也离不开与美国思科公司、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等长期合作。

认为对外开放会影响技术进步，其逻辑无外乎是引进技术或设备会影响自主开发，从而不可能掌握核心技术，其列举的事例之一是国产飞机的技术，而这也是一个误解。在我国技术水平比较落后时期，我们应该以开放的思想引进技术，并在学习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试想，如果没有对外开放，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能成为世界技术领先者吗？“闭关锁国”带来的普遍后果是与现代社会的隔绝。由于缺乏国际

①《王建谈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农垦经济研究》1988年第2期，第33—36页。

②江小娟：《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5页。

③笔者曾经在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求学和工作。当时，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隶属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是国内芯片技术引领者。

④笔者曾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察团去韩国三星公司进行过专门的考察。

竞争的压力，必然带来创新动力不足；由于不能全球有效配置资源，必然带来生产成本上升。高速铁路技术是我国一项伟大的成就，如果没有起点上技术的引进，何谈后期的创新和发展？^①当然高速铁路的发展，除了技术引进外，也离不开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容量。

三、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当代实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

（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统筹国内国外两种市场资源的创新与发展

从表面上看，新冠疫情的冲击、中美贸易摩擦、全球经济衰退是我国调整发展战略，从“国际大循环”为主转向“国内大循环”的动因。事实上，这只是加速我国发展战略转变的外因而不是根本的内因。就笔者的理解，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国际大循环”为主的战略已从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转向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循环方式以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迫切需要改变我国出口导向战略，统筹国内国外两种市场资源，构建新的发展格局。第一，适应国际循环特征的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尤其是2010年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以来，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循环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国际贸易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大幅度降低。例如，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从2006年的63%降到2019年的32%左右；^③在我国按支出法统计的GDP总量中，2019年最终消费占比（消费率）为55.4%，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比（外需比率）仅为1.5%；在2019年GDP实际增长率6.1%中，“三驾马车”中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仅为0.7个百分点；^④第二，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需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差较大，可以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引进技术和设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实现合作共赢。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地位都受到了极大挑战，技术壁垒不断出现，这时如果继续坚持“国际大循环”为主，就会出现类似中兴国际公司被美国任意宰割的局面，发展与安全都存在较大风险；第三，满足“国际循环”更高层次的需求。随着我国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过去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传统的出口导向战略将可能出现“出口失灵”，我们必须通过供

①路风：《冲破迷雾——揭开中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管理世界》2009年第9期，第164—194页。

②黄群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刻内涵、时代背景与形成建议》，《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9—16页。

③黄群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刻内涵、时代背景与形成建议》，《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9—16页。

④蔡昉：《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20年第11期，第17—20页。

供给侧改革来调整产品的结构，在全球分工链条中从低端向高端转移，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而这离开“国内大循环”将无从谈起。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统筹国内国外两种市场资源的创新与发展，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以“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为指引，我国在1997年人均GNI达到750美元，成功跨过了“贫困陷阱”，^①迈入“中等低收入阶段”，并在2010年人均GNI达到4340美元，成功跨过了“中等低收入阶段”，进入了中高收入阶段，^②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奇迹。然而，在2010年，我国经济出现了连续11个季度的下滑，^③2012年GDP的增长率更是创下了12年的新低，而且没有迹象表明我国经济能回到原来的增长路径，仿佛真的要跌入“中等收入陷阱”^④。这表明，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要素价格上涨、环境和资源压力增大等，我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面临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和经济转型的困难。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是新时代面临的重大难题。适应新阶段发展的新变化，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从“国际大循环”为主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三）超大规模市场容量和生产能力为“国内大循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发展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生产环节，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⑤完整和规模最大的供应链条，可以使我国独立于国外市场进行各类产品的生产，也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产品和服务；在流通环节，我国拥有世界上距离最长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航线也四通八达，拥有微信、支付宝、电子银行等便捷的支付结算方式，在互联网的普及程度和网络速度方面也是世界领先的。而且，由于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会出现根据资本的利益将一些地方置于文明社会之外的事件发生，这些条件保证了流通环节的畅通；在分配环节，按劳分配为主和多种分配相结合的形式，兼

①一些文献将我国跨越“贫困陷阱”的时间节点定为1999年，可能是考虑到1998年我国又重新返回到低收入阶段。

②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2020. 注意2010年进入中高收入的阈值为3976美元，而不是3000美元。

③郭冠清：《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上海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第5—18页。

④世界银行每隔4年对东亚经济进行一次主题研究，2007年的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并对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发出警惕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参见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黄志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

⑤黄群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刻内涵、时代背景与形成建议》，《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9—16页。

顾效率与公平，既调动了资本的积极性，也保证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在消费环节，我国拥有 14 亿人口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人均 GDP 达到 1 万美元以上，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容量，为再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The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Constructing a New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GUO Guanqi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Abstract: The “smooth circulation of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proposed by the party in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re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special economic ideolog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of Xi Jinping,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nditions of China’s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result of the two market resourc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irculation involves four indispensable links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How to explain theoretically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still a difficult problem. Focusing on the three aspects of domestic circulation,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and circulation opera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thought history, take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the methodological basis, and the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as the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economic circulation with endogenous state variables under open conditions, and on this basis, analyzes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circul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irculation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Key words: dual circulati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national econom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责任编辑 陈 曦)